

重讀〈杜十娘怒沈百寶箱〉

周 建 渝*

關鍵詞：杜十娘 《警世通言》 三言 馮夢龍 玉堂春
中國短篇小說

〈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據說曾以明代萬曆年民間發生的真實事件為基礎^①，時人宋懋澄於萬曆三十五年，據以寫成文言故事〈負情儂傳〉，收入《九籀集》卷五^②，馮夢龍以之為藍本，將故事改編成擬話本，收入《警世通言》^③。故事所敘，宦家子弟李甲與京城名妓杜十娘相戀，耗盡錢財。十娘助李甲以三百金將她贖身，以圖與李生白頭偕老，不料途中被李生所賣。十娘絕望，與隨身所帶珠寶一起投入江中，故事的結局強化了這段文人與妓女感情糾葛的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①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557。

②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錄：《九籀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112、234。本故事曾在《九籀別集》、《情史》、《文苑楂橘》、《史外叢談》等書中均有轉載，見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117；Patrick Hanan, “The Making of the Pearl-Sewn Shirt and the Courtesan’s Jewel Box”（〈「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沈百寶箱」的成書〉），*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3 (1973), pp. 124-126；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557。其他相關的討論還見於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50-355。

③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421-425、557。

悲劇性質。

文人與妓女的愛情，在傳統的中國敘事文學裏，是一個熱門主題，然而圍繞此一主題所作的敘述，卻各有不同。從較早的唐代傳奇〈李娃傳〉到後來的明代擬話本〈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我們看到作者對於此種愛情關係複雜性質的關注。本文旨在以〈杜十娘怒沈百寶箱〉（以下簡稱〈杜十娘〉）為主要對象，討論其敘述結構及其特徵，並由此結構看到敘述人或作者預設的敘述立場。這一立場隱含在敘述的過程之中，它包括了作者對故事所賦予的社會的、道德的，以及美學的寓意。

一、對應式的敘述結構

出於結構的需要，作者在構成故事時，通常會考慮到敘述在某些層次上的對應關係。這種對應關係或者體現在兩組主要事件之間的呼應上，從而構成一段完整的情節敘述；或者通過兩類不同角色間的對比加以實現，以便有效地揭示出故事的主題。然而，無論是相似性的類比或是相異性的反比，都可以構成某種程度的對應關係。

我們首先注意到，十娘與李甲在敘述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具有對應的關係。在故事前面部分「出院」的敘述中，十娘與鴇母周旋時表現得十分機智，例如她智逼鴇母許諾三百兩銀子為贖身之費，並慷慨解囊，資助李甲籌得贖金。「出院」以後，她又一再資助李甲。與十娘這種機智主動的性格特徵相對應的，是李甲的懦弱與無能。他在耗盡錢財之後，既迷戀十娘，又無力幫助十娘贖身。作者寫他此時的處境是「羞回院中」，「無處投宿，祇得往同鄉柳監生寓所借歇」。當他被十娘叫回院裏，所能做的，「只是流涕，不能答一

語」^④。在幫助十娘脫離妓院的過程中，李甲的被動與軟弱，恰好與十娘的主動、倔強構成一對應的關係，這種對應關係是以兩個角色的相異性為基礎的。後者的被動與軟弱旨在凸顯前者的主動與倔強，反之亦然。

對應的特徵同樣體現在故事前後兩個部分之間的敘述關係上。前部分以「出院」為敘述中心，後部分以「投江」為敘述焦點。「出院」的敘述，旨在突出十娘對於脫離妓女生涯的渴望，作品不厭其煩地言及十娘三次解囊，資助李甲擺脫資財困境的細節，是為了一步步地強化十娘渴望脫離妓女生活的心境；可是「投江」的敘述，則用十娘的絕望呼應了她先前的渴望。作品設置十娘於瓜洲岸邊，人與財寶徹底毀滅的結局，恰好與她「出院」的那段敘述構成一平衡的對應關係，因為前面的「從良」之希望與後面「不遂」之失望兩者之間，在情緒的強烈程度上是成正比的。「出院」與「投江」兩部分設置的意義在於：它不僅在情節方面完成了故事的敘述，而且在結構方面產生了前後兩部分對應與平衡的敘述效果。

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整體敘述中隱含的角色於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之間的差異，在作者的精心設計下，構成了結構上的一種對應特徵。首先來看李甲與十娘兩個角色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在敘述人的交待中，李甲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為布政，李甲本人係國子監太學生。這樣的敘述無疑為了說明：李甲屬於有身分地位那一階層的人。至於杜十娘，敘述人描述她為京城名妓，雖然憑其美色，贏得過多少公子王孫的迷戀，然而地位卻是低下的，因為她畢竟是供人玩樂或洩慾的對象。在敘述人眼中，她的地位顯然要比李甲一類人低下。也正因如此，敘述人要用憐憫的眼光來描述十娘：「可憐一片無瑕玉，誤入風塵花柳中。」^⑤並且還在故事中刻意敘述了十娘為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④ 馮夢龍：〈杜十娘怒沈百寶箱〉，《警世通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卷32，頁488-489。

⑤ 同前註，頁486。

所作的種種努力。在故事的開頭為兩個主要角色作如是背景介紹，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在敘述上的對應效果，因為李甲地位之高與十娘地位之低恰好構成一對應關係。

然而，作者的用意並非僅止於此，他設置這種社會地位的對應其實是為了與另一組對應關係，即道德水準的對應構成一個更大的對應結構，因為在交待了十娘與李甲兩人社會地位的差異之後，作品就很快進入圍繞十娘「從良」的焦點敘述，並且通過李甲與十娘在「從良」過程中心境與行為發生的不同變化，來揭示兩人道德水準的差異。以十娘為例，故事在介紹她受人蹂躪的低下身分後，即轉入敘述她「久有從良之志」，以改變自己作為妓女的身分；「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⑥，便開始了「出院」的冒險經歷。從敘述人的立場來看，妓女從事的色情交易，具有不道德的性質，因為她使得眾多的公子王孫情迷意蕩，破家蕩產^⑦。在此情況下，十娘「從良」的行為，是值得稱道的、有道德的行為。敘述人的這一立場，可以從其圍繞十娘「出院」前後經歷的敘述中，採用正面的、褒揚的口吻這一點上看出來。

這種對於十娘道德水準的稱道，還特別通過十娘後來「投江」的情節敘述得到進一步強化。作品在敘述了十娘多次資助李甲，終於逃出樊籠的種種細節後，又設置了李甲遺棄十娘的事件，從而導致十娘以投江自絕的結局。「投江」情節的設置，意在顯示十娘寧願自我毀滅，也不願因為「從良」而隨便嫁給自己不愛的人，更何況被賣給自己素不相識的孫富，這就從作者與敘述人的角度頌揚了十娘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道德行為。正是由於這樣的結局處理，作品為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妓女賦予了一種時人視為高尚的道德品格。與之相反，李甲雖然身處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可是從故事的敘述中我們

⑥ 同前註。

⑦ 同前註。

看到，他的道德水準遠低於十娘。在作品前部分的敘述中，李甲被描述為一個「撒漫用錢，大差大使」的紈袴子弟^⑧，因為迷戀煙花而耗盡錢財，也斷送了自己的學業，還惹怒了家中的嚴父。顯然，李甲這些行為的道德水準受到了敘述人的質疑與嘲諷。不僅如此，敘述人還告訴我們，十娘之所以要此時「出院」，完全是因為鍾情於李甲，這就加重了李甲對於十娘的道德責任。另一方面，作品一再提及李甲對十娘表示有心娶她^⑨，因為若非十娘相助，李甲早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因此，他對十娘的恩德永世不敢忘懷^⑩。所有這些對兩人情愛關係的敘述，都旨在強調李甲應對十娘「出院」後的命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作者卻在故事的後半部，設置了李甲背著十娘，將她賣給了萍水相逢的商人孫富。作品在這裏有意將李甲對十娘「中道見棄」的行為與十娘對他的一片真情構成對比，這種對比在敘述上形成了一種以道德水準差異為特徵的對應關係：在十娘對李甲愈加信賴的同時，李甲內心卻離開她愈來愈遠。敘述人對兩個角色行為作這樣的對應描述，其用意旨在從道德的層面上，肯定十娘鍾情與真誠品格的高尚，並貶責李甲背叛行為的卑劣。十娘與李甲，一個社會地位卑微，道德品格卻高尚；另一個社會地位高，道德品格卻卑劣。對兩個角色作這樣的性格塑造，顯示了作者試圖用道德水準的差異來平衡與對應社會地位的差異。它試圖說明：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下並不決定或等於其道德水準的高下。杜十娘與李甲這兩個形象告訴我們，社會地位較高的文人，其道德水準可能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妓女還要低下。

然而，兩個角色之間的這種差異又引出另一個深刻的問題：那就在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兩者間，何者在作品中顯得更為重要？〈杜十娘〉一文在故事開端交待人物背景時，提及了兩個角色社會地位的差異，然而，整個故事敘述

⑧ 同前註。

⑨ 同前註，頁488。

⑩ 同前註，頁492。

的重點並不在於這種社會地位的差異，而在於兩個角色道德水準的差異，這一點，恰好印證了厄爾·邁納（Earl Miner）的論斷：「敘事需要以道德差異為基礎。」^⑪

故事前部分圍繞「出院」的敘述，意在揭示身為妓女的十娘如何設法脫離妓女生涯，走「從良」之路。這一行為固然有著改變十娘社會地位的意義，然而更重要的，它具有道德意味，因為妓女從良，在傳統的文學作品中，通常被作為提昇道德水準的一個標誌。這一點可以從敘述人的態度中看出。如前所述，敘述人在作品開頭，就以惋惜的口吻，將十娘身為妓女的遭遇比喻為無瑕玉誤落風塵中。對於十娘終於離開妓院，敘述人將她比喻為脫卻金鈎的鯉魚^⑫。在敘述人眼裏，十娘之所以要「出院」，是因為她認為李甲為人「忠厚志誠」，可託付終身；而後面十娘的「投江」，也是因為李甲對她真情的背叛。在這裏，敘述人借用圍觀船頭的衆人之口，痛罵李甲「負心薄倖」^⑬。無論是敘述人感嘆十娘的「誤落風塵」，或是讚許十娘的「鯉魚脫鈎」；無論是前面稱李甲「忠厚志誠」，或是後面罵他「負心薄倖」，所有的評論都基於對角色道德品質的考量，而非社會地位的考量。隨著敘述的層層推進，敘述人有意識地彰顯與擴大兩個角色間在道德水平上的差距，特別是圍繞著「投江」一段的敘述，敘述人有意將十娘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人格與李甲的自私與負心兩相對比，從而有力地強化了兩者間的道德差異。由此，社會地位雖低、道德水準卻高的十娘與社會地位雖高、道德水準卻卑劣的李甲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對應關係。如果說，「出院」與「投江」兩部分的對應敘述，構成了本作品外在形式的結構，那麼，十娘與李甲兩個角色間在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上

⑪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4, p. 137.

⑫ 馮夢龍：〈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頁491。

⑬ 同前註，頁498。

的對應關係，則構成了作品內在理路的結構，因為它代表了作品蘊涵的寓意或意識形態。正是從這種對應式結構的敘述中，讀者領悟了敘述人及其作者更為關注的焦點，是角色道德水準之優劣，而非社會地位之高低，這一點，顯然與中國文學及史學中注重以道德優劣臧否人物、而非以成敗論英雄的歷史傳統相符合。

二、百寶箱在敘述中的作用

百寶箱在敘述中的作用實在令人關注。它首先出現於故事的標題，然後在故事後半部分的敘述中又一再被提及。敘述人有意採用誇張的手法，鋪張揚厲地描述了箱內珍藏的古玉紫金、夜明珠、祖母綠、貓兒眼等，其意在於向讀者張示，這諸般異寶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然而，當這個眾人珍視的寶箱與其持有人雙雙毀滅之時，其悲劇性的震撼力量更足以令人驚心動魄。

以往的論者通常注意到十娘與李甲兩個主角在故事敘述中的關係，卻相對忽略了百寶箱的意義。在我看來，百寶箱並非僅僅是一筆附屬於十娘的財產而已，它在故事的敘述結構中實在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三言」眾多故事裏，我們常常看到諸如百寶箱一類物件的設置，例如蔣興哥的珍珠衫^⑭、沈小霞的〈出師表〉^⑮，以及滕大尹手中的「行樂圖」^⑯等等，這些物件看似敘述人隨手拈來的小道具，其實，它們在敘述中所起的作用卻非同小可，儘管其在各自的作品裏具有不同的特徵。〈杜十娘〉裏的百寶箱對於推進故事的敘述、塑造角色形象，以及呈現故事主題，都是深具意義的，儘管它在敘述的開端並

⑭ 馮夢龍：〈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喻世明言》（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卷1，頁1-36。

⑮ 馮夢龍：〈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世明言》，卷40，頁612-644。

⑯ 馮夢龍：〈滕大尹鬼斷官司〉，《喻世明言》，卷10，頁140-159。

未出現。

首先我們看到，百寶箱祕密的逐漸揭開，對於推進故事的敘述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可從它與李甲這一角色的互動關係中得到解釋。箱中祕密的逐步揭開，與李甲對於十娘的誠心逐漸變質幾乎是同步發生的。故事開始的敘述中，透過十娘的眼睛，交待了李公子是一「忠厚志誠」、可托終身的男子，由此開啓了十娘攜帶寶箱、從良李甲的冒險經歷。李甲當初並不知道十娘有百寶箱，這一事實恰好與他不懂得爲十娘落籍是一致的。在十娘的鼓勵之下，李甲開始了贖妓的行動，先是向親友借錢，屢遭碰壁，然而，這畢竟顯示出他的誠心，於是，十娘先則施銀一百五十兩予李甲助其贖身，繼之予銀二十兩作舟車之費，可說是百寶箱祕密顯露的開始^{①⑦}。逮及十娘離開妓院，與李甲同回南方，途中再次取出五十兩銀，這時百寶箱已經從暗處來到明處，不過敘述人有意安排李甲因爲自慚無能，「不敢窺覷箱中虛實」^{①⑧}，百寶箱的祕密仍然未被徹底揭開。作者作這樣的情節安排，是爲了對應李甲一方尙無勇氣面對「嚴親懷怒」這樣一個事實^{①⑨}，而寶箱祕密的最終揭開，則因應了李甲的「中道見棄」。一方面是滿箱珠寶的呈現，一方面是對此珠寶的失去，當燦爛美麗的無價之寶終於顯現之日，同時就是它永遠逝去之時，這種極具戲劇性的情節設計，爲故事的敘述創造了富有寓意的高潮，它將極爲珍貴的珠寶與李甲的錯失寶珠置於一對立的關係上，從而通過前者的珍貴與永遠失去來強化後者的愚蠢與錯失良機，就如十娘投江前對李甲所說的那樣：「妾櫝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②⑩}作品的諷喻性質由此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①⑦ 雖然這裏的銀兩是以藏在絮褥的方式轉予的，可是作爲財富，它卻與百寶箱中的祕密直接相關。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那也是從百寶箱裏取出來的。

①⑧ 馮夢龍：〈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頁492。

①⑨ 同前註，頁495。

②⑩ 同前註，頁498。

問題還不僅於此。故事把百寶箱與十娘始終結合在一起，勢必暗示了兩者間存在著某種內在的關係。一方面，箱內夜明之珠盈把，多為無價之寶。箱中珍寶的價值，足以應付十娘與李甲浮居蘇杭勝地的餘生。然而，十娘並未向李甲洩露這一祕密。這種懸念的背後暗示了十娘性格的內斂，因為從「贖身」到「南歸」的整個過程中，十娘給予讀者的印象，是處事深思熟慮，而非外表浮華、內心空虛的那種人。另一方面，身為妓女的十娘立志「從良」，為了脫籍，她費盡了心機。在敘述人看來，這無疑是值得褒贊的道德行為。滿箱的珠寶與從良的行為，前者以物質的具體形態體現了眾所珍視的價值，後者則以道德的抽象形態凸顯了同為珍貴的價值。兩種價值與財富相互說明，構成了故事的敘述主幹。

然而，兩者間所以能夠相互說明，實在是由於百寶箱與十娘之間具有一層隱喻的關係。寶箱的出現，是與十娘的「出院」同時產生的。在十娘「出院」之前，寶箱隱藏著不見天日，這一點恰巧既暗喻了十娘在妓院裏的生活境遇，是「不見天日」的；同時也隱喻了十娘的高尚人格被埋沒在妓院，而不為世人所知。當十娘離開那「不見天日」的風塵生涯時，寶箱也隨之見了天日。寶箱由暗處向明處的轉變，似乎隱喻了十娘脫籍、回到正常人生活的這種轉變。然而在那時，箱內的珠寶仍藏而不露，則又以對應的方式暗示了十娘「出院」後依然前途未卜這一事實。寶箱祕密揭開的那一瞬間，也就是十娘人格形象被以聚焦形式呈現出來的那一瞬間。寶箱祕密揭開的同時，也就是它永遠消逝之時。與這一事件對應的是：十娘以投江而死的行為，拒絕了李甲與孫富的交易。

兩個事件的並置敘述有力地強化了百寶箱與十娘兩者間的隱喻關係。當十娘懷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那種時人視為珍貴的道德決心投入浩瀚江流之中時，那滿箱的無價珍寶也同時被拋入一去不返的江水。作者這樣的設計是頗為出色的，他用具體的、世人珍視的那一箱寶珠，隱喻和強化了十娘投江行為

所蘊涵的道德性質。十娘投江之前曾對李甲說：「妾櫝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櫝中有玉」實際上暗喻了十娘的人格，並為後面的人玉俱毀作了註釋；「眼內無珠」則諷喻了李甲人格的淺薄，他本期望以賣掉十娘所得的千金，回家抵償京城生活的過失，卻沒想到失去了價值遠遠超過千金的百寶箱以及他仍然眷念的美人。如果說，十娘為妓，猶如百寶為黑箱籠罩，無見天之日，那麼，一旦「從良」不逞，百寶也就隨之泯滅。十娘與百寶箱雙雙毀滅的結局設計，既有效地凸顯了李甲在感情上首鼠兩端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又有力地強化了「明珠暗投」的故事主題，同時在敘述上，產生出激動人心的美學效果。讀者以及故事中兩岸圍觀的群眾被深深打動而深為嘆惜的，既是十娘拋棄的滿箱珠寶，同時又是那箱珠寶所暗喻的「全玉而毀」的人格。

如前所述，在經濟的天平上或是在道德的天平上，百寶箱所代表的財富與十娘立志從良的意志都是無價之寶。然而，敘述人既不讓十娘用此珍寶來解脫李甲的財源之窘，也不安排十娘離開李甲與孫富，帶著滿箱珍寶，毅然另尋生路，卻安排十娘與此寶箱的雙雙俱毀。在這種令讀者大為嘆惜的結局處理背後，自然有其寓意。由於滿箱珠寶被用來比喻十娘「舍妓從良」及「全玉而毀」的道德人格，那麼，當這一人格的載體（十娘）投江以後，寶箱所喻的主體已經不復存在，則寶箱的繼續留在人間，也就失去了意義。從這裏，我們進一步看到百寶箱與十娘之間存在的隱喻關係，也理解了故事何以要安排十娘與寶箱的雙雙俱亡。

然而，用百寶箱隱喻十娘的方式也凸顯了敘述人持有的道德立場，因為在敘述人看來，如果十娘未能從良，她就永世得不到道德拯救，也就如盈把的珠寶，永遠被封閉在那個盒子裏。珠寶封存在箱裏，暗喻了再美的女人，如果從妓，便是道德的墮落；其風塵花柳的生活境遇，是黑暗而不見天日的。從這裏我們看到，在故事敘述的背後，隱含著一種明確的道德立場。就如厄爾·邁納

(Earl Miner) 所說的：「敘事要求一種道德的情感主義。」^②作者把十娘與百寶箱作如是安排，實在是爲了強化這一道德寓意。

三、妓女與文人價值觀

然而，十娘的悲劇結局又引出了另一個更爲深刻的問題，這就是故事中妓女的命運與傳統中國文人價值觀的關係。如果把十娘的故事與「三言」中其他有關妓女故事作一比較，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一個妓女的行爲選擇與文人的價值實現並行不悖的時候，故事對妓女命運的處理，就會相對地來得好；相反，當兩者發生衝突時，妓女的命運結局就會來得相當糟糕。

這樣的理解是基於「三言」中對杜十娘與玉堂春兩個妓女不同命運的敘述。兩個故事涉及的，都是傳統社會裏文人與妓女的愛情主題，然而在情節與人物命運的處理方面，卻各自不同。杜十娘的故事如前所述，此不贅言。玉堂春的故事見於「三言」中〈玉堂春落難逢夫〉（以下簡稱〈玉堂春〉）一文。書中講述公子王三官在京城妓院，爲名妓玉堂春耗盡錢財，落難爲乞丐，後在玉堂春幫助與鼓勵下，發憤讀書，取得功名，並娶玉堂春爲妾。故事的主題與情節設置，與唐傳奇〈李娃傳〉多相似處。

〈杜十娘〉故事前半部的某些敘述，與〈李娃傳〉中的敘述也甚爲相似，後半部卻恰好反其道而行之，給人的印象似乎是：當〈玉堂春〉基本承續〈李娃傳〉的情節敘述模式之時，〈杜十娘〉作者有意要對〈李娃傳〉的後半部分敘述進行改造。玉堂春通過拯救王三官於落難困境，鼓勵他取得功名，自己也因此得到「舍妓從良」的如意結局，使讀者聯想到了李娃的相似結局。可是杜

^②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 4, p. 137.

十娘人與物雙雙俱亡的結局，卻打破了〈李娃傳〉、〈玉堂春〉那樣的敘述模式。這裏牽涉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為什麼作者不為十娘設置一個相似於李娃或玉堂春那樣皆大歡喜的結局呢？

我以為以上對兩個妓女命運的不同處理，其背後隱含著傳統社會裏文人價值觀的考量。在以文官制為主要特徵的傳統中國社會裏，通過讀書求取功名，獲得官職與前程，乃是隋唐科舉制度建立以來，中國文人共同追求的目標。在這一文化氛圍裏，文人價值觀的實現，通常與以讀書求取功名這一目標的實現，有著密切的關係。表面看來，〈杜十娘〉與〈玉堂春〉兩部作品對故事人物命運的處理各有不同，然而實際上，兩者所基於的出發點或預設前提，卻是大致相同的，這就是根據故事角色的行為與文人功名前程的關係來決定他們的命運。在這樣的預設前提下，以文人與妓女的愛情為主題的作品，往往遵循著這樣的敘事模式展開敘述：公子沈溺妓院，耗光錢財而淪落絕境；妓女助之，然而其目的卻是勸其浪子回頭，復歸追求功名之正道。前面安排公子落難陷入絕境，是為了他從貪戀煙花所面對的後果中醒悟過來，從而為後面的「浪子回頭」提供前提條件，可算是「陷之死地而後生」的情節敘述。然而，「落難」的敘述是為了引導公子回到發憤攻書、實現功名的傳統正道上來。在〈玉堂春〉裏，故事刻意安排了玉堂春於臨別前對王三官的一番勸告：「見了二親，用意攻書，倘或成名，也爭得這一口氣。」²²與李娃同樣，玉堂春幫助王三官回到了科舉正途，並榮登金榜。玉堂春這一行為在當時社會的文化氛圍裏是受到肯定與鼓勵的，作為回報，故事也為她安排了償其所願的結局，讓她從妓女生活中得到拯救，並與昔日鍾情的嫖客結成夫婦。玉堂春之所以得到如其所願的結局，是因為她鼓勵公子重回功名正道的行為。作品通過這種結局的處理，直接肯定與強化了傳統社會裏文人的價值取向。

²² 馮夢龍：〈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頁352。

與之相反，杜十娘卻沒有像玉堂春那樣，受到作者的「善待」。在故事的敘述中，她並沒有像玉堂春或李娃那樣，在李甲爲她蕩盡資財、陷入困境之時，鼓勵李甲復歸科舉正道。與之相反，她卻提議與李甲浮居蘇杭。由於這種文人與妓女的關係沒有以科舉及第作爲預設條件，因此與文人價值的實現大相逕庭。故事的作者似乎注意到這一問題，於是賦予這對情人以完全不同於玉堂春或李娃那樣的結局，也就是說沒有給予他們任何出路，而是讓十娘帶著寶箱雙雙投江自絕，讓李甲「鬱成狂疾，終身不痊」^{②③}。作品通過這樣的結局性敘述，實在暗示了這樣的寓意：當一個文人戀上一個名妓，他似乎面臨了前程與命運的重大挑戰。然而，惟其將對美色的鍾情與其自身的功名前程結合起來，通過功名獲取的成功達到對美色的擁有，這樣才可能兼取魚與熊掌^{②④}。如果因爲美色而捨棄對功名的追求，其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失。功名仕宦是決定這種文人與妓女關係能否成功維持的基礎，因爲它直接關涉到傳統文人的立身之本。在故事的作者眼裏，十娘與李甲這種「文人與妓女」的愛情關係由於脫離了這種立身之本，似乎有違正道，所以，作者不讓他們有一個如願的結局，而是讓他們兩敗俱損。從這樣的結局設置中，我們看到作者在對文人妓女愛情主題之敘述上所持有的社會價值觀。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裏，文人嫖妓並非被視爲罪不可赦的行爲，然而，當他因爲嫖妓毀了自身的功名前程，這才爲社會所不齒。即使公子出身名門，家藏萬貫，也勢必會在煙花身上蕩盡錢財，「敗家子」這一稱呼，可說是含有社會及父輩對這類公子切齒的詛咒。從十娘與玉堂春的不同結局處理中，我們看到兩部作品持有一種相似的立場：當功名與美色兩者間發生衝突的時候，敘述者是寧取功名、不要美色的。如〈玉堂春〉裏，王三官爲玉堂春被賣之事而傷心時，其朋友都來勸他：「功名是大事，婊子是末節，

②③ 馮夢龍：〈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頁499。

②④ 此一觀念在清代衆多的才子佳人小說裏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見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頁108-114。

那裏有爲婊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這樣的議論，實在代表了當時人對於兩者孰輕孰重的一般看法。

儘管〈杜十娘〉在很多方面不同於〈玉堂春〉與〈李娃傳〉，它們在作品中預設功名及第的前提上，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玉堂春通過幫助王三官「金榜題名」，把曾經偏離傳統正道的文人拉回正統的軌道。王三官的功名及第，顯示了他終於向正統文化傳統的復歸，而玉堂春在公子由淪落轉向復歸、由努力走向成功的整個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爲這樣，才爲玉堂春自身命運的轉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由於她幫助公子從一個在道德上與功名上雙雙墮落的「敗家子」改造成爲科甲中人，她也因此成爲了都御史의 寵妾，有了子孫繁盛的結局²⁵。與之相反，十娘沒有鼓勵李甲走科舉之路，卻慫恿他中途退學回南方，甚至約他「於蘇杭勝地權作浮居」。這樣的選擇，顯然背離了傳統社會對於文人的期待；也因爲這樣，作品的敘事面臨著對於這對情人結局處理的挑戰。如果要給予十娘與李甲一個「白頭偕老」式的結局，那麼，怎樣處理這對年輕戀人與李甲嚴親之間的衝突？因爲在身爲布政使的嚴親眼裏，這個爲煙花女子而捨棄功名的「逆子」以及引誘他淪落如此的十娘，是難以得到寬恕的。其次，如果要給十娘與李甲一個逍遙生活於蘇杭的結局，那麼，又怎樣處理這對戀人與文人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很顯然，作者在這兩者的衝突中，通過十娘與李甲兩人悲劇結局的设计，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與態度。如果說玉堂春與王三官的團圓結局從正面肯定了中國文人的傳統價值觀，那麼，十娘的自絕與李甲的「鬱成狂疾」則從反面強化了同一價值觀，它似乎暗示讀者：像李甲那樣背離功名道路的傳統文人，無論在事業上或是在婚姻上，都不會有成功。

²⁵ 馮夢龍：〈玉堂春落難逢夫〉，頁374。

四、男權中心的敘述視角

儘管〈杜十娘〉與〈玉堂春〉對兩名妓女命運的設置十分不同，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卻引起了我們的關注：無論是杜十娘或是玉堂春，作為妓女，她們都有待於男人去拯救。作品這樣的敘述，引導我們看到其背後隱藏著男性中心的預設立場。在傳統的文學中，女性的行為方式為傳統的文化所拘囿，而傳統文化的規則卻是由男人權力所制定的，由此決定了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弱勢地位。女性在文學中的形象，通常是被動的、受男性支配的、不能自主自己命運的、邊緣化的，在社會政治舞臺上是沈默的，因為「修、齊、治、平」、「建功立業」通常是男人的理想和抱負，與女子無緣。與之相反，歷代出現的女性干政的事件，在文學的作品裏多被賦予負面特徵。《封神演義》裏的妲己，是害人的妖精；〈飛燕外傳〉裏的趙飛燕，是以色禍國的標誌；〈長恨歌〉中的楊貴妃，被當成引發「安史之亂」的禍源。「女禍說」在中國文學傳統裏是一個敘述的主題。

從女權批評的角度，可以幫助我們去質疑以往作品中描述女性形象之背後的種種假設前提，以及那種以男性為中心的道德標準等等。為什麼西門慶能夠縱慾，潘金蓮卻不能有婚外情？為什麼沈復能納妾嫖妓，陳芸卻只能從一而終。人們可以作如此簡單的回答：因為當時的社會使然。然而這樣的回答僅是社會學的，而非文學的。我們所關注的是：作者為什麼要從這樣的角度去結構一種敘述？從這樣的敘述中隱含了怎樣的社會與道德寓意？文學又是怎樣通過這樣的敘述，強化了源遠流長的以男性為權力中心的意識形態？

十娘因為靠李甲解脫自己的希望遭到破滅而投江，玉堂春卻通過拯救王三官的功名前程，而拯救了自己，這樣的敘述反映出男性文人對傳統妓女命運及其歸宿的期待心理，然而從中我們看到了故事敘述背後潛在的男權中心觀念。

如前所述，在「出院」與「投江」的整個情節敘述中，十娘的主動機智處處與李甲的懦弱猶豫、不知所措形成強烈對照。一方面，作品將李甲在十娘「出院」過程中的作用描述得消極被動，例如敘述他渴望與十娘長相廝守，卻又因為「阮囊羞澀」而一籌莫展。在十娘一次又一次解囊相助時，他被描述為「自覺慚愧」^{②⑥}。「出院」過程的整個敘述給予讀者這樣的印象：若不是十娘的精心策畫，李甲非但得不到十娘，而且很可能因此窮愁潦倒，落得像〈李娃傳〉中滎陽公子行乞的下場。為此，敘述人專門作了如下提示：

公子且驚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矣。

此情此德，白頭不敢忘也。」自此每談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涕。^{②⑦}

另一方面，作品巧妙地通過一個個事件，凸顯了十娘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從當初與鴇母周旋，智訂三百兩銀子為贖身之費，到幫助李甲籌得銀兩，以死威逼鴇母不得食言，以及出院之後對李甲的資助等等，在在顯示出十娘的聰明機智。

然而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懦弱被動的李甲在實質上卻對十娘的命運起著主動的、決定性的作用。十娘費盡心機，雖然擺脫了妓院生活，卻終於擺脫不了李甲對她命運的主宰。今天的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麼作者要安排十娘在發現李甲負心之後，投江自絕於人世？難道不能讓十娘有別的選擇，譬如安排她帶著那箱珠寶告別李甲，開始獨自的生活。然而，作者顯然注意到這種結局的不可能性，因為在一個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裏，像十娘這樣的女子，是很難得以獨立於世的。如果作品讓十娘離開李甲後，重操舊業，那麼整個故事的主題將會受到影響，這一可能性也是作者不願看到的。在十娘投江這一結局安排的背後，似乎有著這樣的寓意：一個女子命運的吉凶與否，決定於男子對她的取與

^{②⑥} 馮夢龍：〈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頁492。

^{②⑦} 同前註。

舍，取之則吉，舍之則凶。一方面，無論十娘多麼聰明，怎樣地為改變命運而努力，她總是不能離開男人而自主自己的命運；另一方面，李甲這一角色儘管十分軟弱，卻竟然在未與十娘商量的情況下，有權力將十娘賣與鹽商孫富。且不說十娘贖身的三百兩銀子中有一半是出自她自己的，且不說加上出院後的旅資，十娘所出，何止一百五十兩？可是在作品的敘述中，所有這些付出以及在此付出背後蘊涵的真情與苦心，在李甲與孫富的交易面前被擊得粉碎。如果我們注意到賦予李甲這種決定與改變十娘命運的權力的，是他們所處社會裏男性支配女性的那一整套道德觀念，也就不難理解李甲為何膽敢賣掉十娘，以及為何十娘的抗爭竟表現為自我的毀滅。從個人為了改變命運而奮鬥的一面看，十娘似乎居於強勢的地位，李甲則處於弱勢；然而，從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看，李甲卻處於強勢，十娘卻居於弱勢。作品有意讓她脫離不了李甲作為男性對於女性的控制力量，使她終於被當作商品或奴隸一樣，被賣給另一個商人。兩個強勢與弱勢角色之間形成的張力，是通過表象與內裏分離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也是在個人改變命運的奮鬥與社會道德力量之間的衝突中呈現出來的。同時，也恰巧由於這種張力的呈現，使故事顯得激動人心。

作品將十娘與李甲的感情設計在一個表面上羅曼蒂克、實質卻十分脆弱的基礎上。表面看，十娘極具優勢：既有色，又有財；實質上作為女人她十分脆弱，也經受不起男人變心的打擊；李甲雖然表面上懦弱無能，卻以男人的性別優勢主宰了對方的命運。十娘對「從良」之選擇的主動、堅決、百折不撓與李甲的懦弱形成強烈對比，而李甲的最終動搖又導致十娘的毀滅。如此的設計實在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前提：紅顏女子命運的吉凶，取決於男性的選擇；如果淪為妓女，那就更得靠男人拯救而不能自拔。即使她既具美貌，又有萬貫資財，也仍要受制於男性的取舍，取之則貴，舍之則賤。即使這男性是一個懦弱無能之輩，女人的價值也有待他的承認與接受。這一預設前提充滿了傳統中國社會裏男權中心的文化意味。一方是財色俱佳，其命運卻受人制約，就因為她是女

人；另一方既無財，又談不上色，也無傑出的才，卻能夠左右另一方的命運，就因為他是男人。這些在現代社會裏被視為荒誕而不可思議的兩性關係，在故事裏卻成為不可動搖的人倫法則。

人類力量的強與弱，是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基於性別差異的強弱之力量對比，又是以表象與實質對立的方式體現出來的。表面的強勢背後隱含的是實質的弱勢，內在的優勢則是以懦弱無能為表象的，〈杜十娘〉對兩個主要角色的形象設計實際上蘊涵了反諷的意味。

反諷的寓意還見於作品對李甲道德品格的敘述中。從作品開始不久，故事就通過十娘的視角，確認了李甲是一位「忠厚志誠」的公子²⁸。從傳統的婚姻道德標準看，這是一種至關重要的人品：也正因如此，十娘才與李甲「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²⁹。這種「忠厚志誠」的品質在故事往後的敘述中，得到不斷的強化。李甲周旋親友，以「假貸路費」為由，企圖為十娘湊得贖金，卻四處碰壁。十娘助其一半贖金，是因為看重他的「忠厚志誠」。如前所述，作品細寫李甲對於十娘一再資助的「感激流涕」，也旨在凸顯李甲的「忠厚志誠」。可是在這樣的一再鋪敘之後，作品於後面卻安排了李甲「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的事件，來為故事主角這段感情糾葛畫上休止符。作品後面部分的敘述徹底顛覆了前面部分的敘述，敘述人用李甲「中道見棄」的行為，來嘲諷了他的「忠厚志誠」。

作為本文的結論，〈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採用對應式的敘述結構，在揭示故事角色之間社會地位之差異與道德水準之差異的同時，更強調了角色道德水準之差異，從而有效地彰顯了故事的寓意。百寶箱與杜十娘之間的隱喻關係，從另一方面促成了角色形象的成功塑造。至於十娘與李甲的悲劇結局，既從反

²⁸ 同前註，頁486。

²⁹ 同前註，頁487。

面強化了傳統文人追求功名的價值觀，又從正面顯示出具有男權中心色彩的敘事之預設前提。

重讀〈杜十娘怒沈百寶箱〉

周 建 渝

提 要

「出院」與「沈江」兩部分的對應敘述，構成了本作品外在形式的結構；十娘與李甲兩個角色在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上的對應關係，構成了作品內在的理路結構。整部作品採用這種對應式的敘述，在揭示故事角色之間社會地位之差異與道德水準之差異的同時，更強調了角色道德水準之差異，從而有效地彰顯了作品的寓意。百寶箱並非僅是一筆附屬於十娘的財產，它以物質形態上眾所珍視的價值，隱喻了十娘「全玉而毀」之人格的價值。

本故事的結局雖不同於〈玉堂春落難逢夫〉，兩者的預設前提卻基本相同。玉堂春由於幫助王三官向科舉仕途復歸，使自己的命運得到拯救。杜十娘慫恿李甲輟學南歸，背離了科舉正道，因而導致兩敗俱損。前者通過設置玉堂春與王三官的團圓結局，從正面肯定了中國文人的傳統價值觀；後者則安排十娘與李甲以悲劇收場，從反面強化了同一價值觀。然而，無論是杜十娘或是玉堂春，都有待於男人去拯救。十娘與李甲基於性別差異的強弱之力量對比，是以表象與實質對立的方式體現出來的。表面的強勢背後隱含著實質的弱勢，內在的優勢則以懦弱無能為表象，由此使兩個主要角色的形象設計蘊涵了反諷意味。然而十分重要的是：他們的悲劇結局凸顯了以男權為中心的文化意蘊。

A Re-reading of “Tu the Tenth Sinks the Jewel Box in Anger”

ZHOU Jianyu

The parallel narratives of the “getting out of the brothel” and “plunging into the river” form the external structure of this story, while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of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with their different social and moral status, constitute its internal structure. The story, however, puts more emphasi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s’ moral quality rather than their social class, thus revealing effectively the main theme of the story. The jewel box represents not only the wealth of Tu the Tenth, but also Tu the Tenth herself; as it refers to Tu the Tenth’s will to die rather than to accept change.

Although different in its conclusion, the story “Yu-t’ang Ch’un in Misery Meets Her Lover,” shares a common assumption with “Tu the Tenth”. Yu-t’ang Ch’un rescues herself by helping Master Wang to return to the orthodox path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u the Tenth, however, destroys herself by taking Master Li away from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happy ending of Yu-t’ang Ch’un and Master Wang’s story confirm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of Chinese literati from a positive perspective, while the tragic ending of Tu the Tenth and Master Li strengthens the same value from a negative point of view. In any event, Tu the Tenth or Yu-t’ang Ch’un, as women,

both have to be rescued by the male characters. The power-difference between Tu the Tenth and Master Li, based on their gender, is presented as a contrast between their appearance and essence. Master Li's apparent strength covers his real weakness and vice versa, and this makes the design of characters ironical. However, very importantly, the tragic ending of Tu the tenth evokes a culture centered on male chauvinism.

Keywords: Tu the Tenth *Common Words to Warn the World*
Three Words Feng Meng-lung Yu-t'ang Ch'un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